

2/02

江津文史資料選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四川省江津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第十二辑

江津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江津县委员会
文 史 资 料 委 员 会 编

1991. 12.

封面题字 杨超
封面设计 左森荣
顾问 宋正祺
主编 王增辉
副主编 马 奔
责任编辑 廖 敏
校 对 潘 虹
 刘晓苏
 侯铁生

江津文史资料选辑十二辑
(内部资料)

编辑：江津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印刷：江津县印刷厂

开本：787×1092印张6 字数11万

印数：1—2000册 1991年12月

江津县内部刊物准印证第024149号

工本费2.00元

目 录

- 对江津县土地改革工作的回忆.....王 昭 (3)
- 江津农业主要项目概况.....王勋 钟顺宾 (11)
- 发展中的江津水泥工业.....王饮永 (20)
- 白沙工业发展记略.....刘子华供稿
文史办整理 (25)
- 记珞璜长江大桥的修建.....王增辉 廖宗扬 (31)
- 解放前江津“滨江路”的修建.....王增辉 廖宗扬 (35)
- 白沙交通运输事业发展概况.....程智铭 (38)
- 江津第一个全国先进单位
——油溪供销社.....曹辉金 (53)
- 江津大明电灯公司概略.....程迪琪 (61)
- 巴蜀多美酒，江津秀一枝——谈江津白酒.....兰庆君 (66)
- 江津名酒红茅烧.....兰庆君 (71)
- 曾销国外的江津白酒.....夏忠国 (73)
- 山王店银丝挂面.....杜映鹏 (76)
- 江津教育发展简况.....王长钧 (81)
- 江津大公书店.....张西洛 (93)
- 回忆《白沙日报》的几次风潮.....吴伯麟 (96)
- 再生稻在江津.....梁大成 (103)
- 记我县“脚踏式人流吸引器”的研制.....唐翼南 (108)

回忆祖父程智谔.....	程绪昂 (112)
曹麟书先生事略.....	廖德富 (117)
张鹿秋简介 (附张仲华事略)	蒋凌霜 供稿
	漆保邦 整理 (121)
冯玉祥将军与先父吴芳吉.....	吴汉骧 (125)
白屋诗人吴芳吉与聚奎学校.....	罗昌一 (129)
吴芳吉先生以德化人二三事.....	肖嘉辉 (139)
词曲学家卢前在白沙.....	张寿康 (143)
回忆叔父“诸三太医”	<u>诸有常</u> 供稿
	韩志平 整理 (148)
江津近现代部分名老中医简介 (续)	
.....	邹绪良 王锡玉 (155)
一个被忽略了的历史人物——彭大雅.....	罗昌一 (160)
江津县的参事会和议事会.....	邓宦荣 (163)
民国时期江津县的公债负担.....	郭建中 (166)
保钧忆及的抗战史实二则..... (台)	朱运良 (170)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江津的气候.....	范征文 (174)
江津重点文物简介 (续)	黄中幼 张明财 张荣华 (179)
江津县民间流传的卫生谚语.....	王锡玉 (183)

对江津县土地改革工作的回忆

王 昭

土地制度改革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一场以亿万贫农、雇农为主力，以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为目的的群众运动。三千多年来，封建地主阶级能任意欺压农民，主要依仗他们占有的土地；而加租加押，甚至超经济剥削，亦是靠的土地。所以，要消灭封建地主阶级，就必须彻底改变土地制度，摧毁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土改斗争的实践证明，只要经济基础垮了，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的威风和活动能力就小了；而只有在彻底摧毁其反动气焰的条件下，地主阶级才会低头认罪，人民政府的土改法令才能得到认真的执行。解放初，我在江津任县长职务，自始至终参加了全县土改的具体领导工作。现根据有关资料和本人的回忆，对这一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作一简述。

一、土改的基本部署

江津县的土改，开始于1951年5月，是在全县已基本完成减租退押的基础上展开的。当时全县已有农会会员二十二万人，农民武装一万八千人，村政府初步建立，敌我力量对比已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通过减租退押斗争，全县贫雇农民阶级觉悟有所提高，经济上也得到一定的实惠，为进一步解放生产力而迫切要求彻底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土改的时

机已经成熟。

土改的法律依据，是中央人民政府1950年6月30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这个土改法令是根据全国解放后的情况，从有利于孤立和分化地主阶级，团结全体人民有秩序地实现土地改革，有利于社会安定和生产出发而制定的。它对地主和富农都实行了较宽大的政策。例如对地主，由过去没收一切财产改为只没收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的多余房屋，其他财产（包括地主办的工商业）不予没收；对富农，则由过去征收其多余的土地财产改为保存富农经济，除征收其租出的大量土地外，保护其自耕（及雇人耕种）部分土地和其他财产，即使出租的小量土地亦予保留。

根据这一法令，土改工作的总路线、总方针是：依靠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此外，土改工作还必须遵循政务院颁布的《农民协会组织通则》、《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和《人民法庭组织通则》等有关规定办事，以保证土改的顺利进行。

江津的土改是在党的领导下，由地委统一组织力量，分期分批逐步进行的。全县七十一个乡共分为三批，第一批三十二个乡，即德感、双龙、九龙、临峰、福寿、和爱、双河、油溪、吴市、金刚、稿子、李市、罗坝、龙门、慈云、刁家、夹滩、仁沱、顺江、白溪、永丰、贾嗣、五福、广兴、先锋、石门、三口、涨谷、河口、双石、高牙、麻柳。

第二批也是三十二个乡：吴滩、丹凤、高歌、杜市、崇兴、龙吟、永兴、儿子、长冲、现龙、高屋、二溪、石蟆、

大桥、黄泥、青泊、紫云、太平、塘河、珞璜、和平、马宗、真武、金紫、龙山、永安、板桥、回龙、转龙、朱沱、大河、羊石。

第三批只有七个乡，即清平、蔡家、太和、三合、柏林、双凤、四面。

二、土改的力量配备

江津是个有着百多万人口的大县，地处重庆市上游，解放前反动组织多，封建势力亦大。据统计，全县地主仅占人口总数的6%，而占有的土地却达全县土地总数的70%左右。如吴市乡七村，地主占全村人口总数8.8%，占有土地占全村面积的71%。而这些土地又集中在几个大地主手中，如伪师长廖海涛和陈进阶、陈翠臣数人，收租都各在五千石以上。这些大地主往往各自占据一个到几个乡（如石门乡的赵家、圪河乡的唐家、石蟆乡的卞家、仁沱乡的朱家等），成为当地政治、经济、军事（指乡保武装）三位一体的事实上的统治者。他们以地租为主要手段对农民进行超经济剥削，最毒辣的则是加租加押，其最甚者竟超出产量十倍以上。高牙乡贫农曾义成租廖海涛土地，租谷年二十七石五斗，押金却高达九十六石，十一年后更增加到五百三十二石，还要无偿地为他劳动，连饭也不给吃。此外，地主阶级还对农民进行骇人听闻的欺压，逼死佃户全家之事时有发生。白沙镇大恶霸夏培德，看到哪个佃户的女儿美貌，就要送到他家任其奸污，真是禽兽不如。土改工作面对这样穷凶极恶的敌人，任务是十分艰巨的。

为了组建一个力量强大的土改工作队，江津地委从地专

机关抽调干部201人，从永川、大足、綦江、荣昌、璧山五县抽调干部865人，加上我县抽调的981名干部和1355名农村积极分子，以及1503名小学教师、247位民主人士，组成了五千多人的土改大军，以集中力量打歼灭战。领导力量方面，是由地委张凤伍同志（民运部长、后为地委副书记）亲自指导，江津县委书记芦云亭同志具体指挥，包括江津县委全体成员和各县抽调来的县委书记、部长、区委书记在内，组成了一个有二十三位成员的土改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芦云亭、王昭、王沛贤三位同志分任正副主任，还吸收了党外人士如卞稚珊、何策襄等五人为委员，因而具有统一战线的性质。土改中，许多民主人士和党外人士委员同县委的同志一起，到各区乡召集地主分子开会，通过现身说法宣传党的政策，对分化地主阶级，推动土改顺利进行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三、土改的具体步骤

江津的土改工作，是首先经过典型试验，取得经验，然后分批训练干部和积极分子，在全县范围内逐步展开的。各乡土地改革不管分几步走，总的说来前一阶段是交待政策，划分阶级队伍，登记土地财产。后一阶段是查田评产，分配土地，健全政权机构和各种有关组织。具体做法分为四个步骤。

第一，宣传土改法。组织学习宣传《土改法》、《农民协会组织条例》、《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人民法庭组织通则》等有关政策法规。干部深入群众，和贫雇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向他们讲解政策以做到家喻户晓。在

此基础上，从思想上组织上整顿村政权、农会和民兵组织。

第二，是组织阶级队伍，划阶级、定成分，没收地主财产。划分阶级成分在于分清敌我，团结自己，孤立敌人。这是执行土改政策的政治基础，土改胜利的关键。它既是对地主进行斗争和对农民进行阶级教育的过程，同时亦是发动群众的过程。要充分发动群众讨论，报区审批，张榜公布。对地主财产宣布没收，进行造册登记。

第三步是报实产量面积，评定产量。依靠贫雇农，成立评查小组，要求“评得确实，分得公道”。具体是自报公议，逐块评定，做好登记统计工作。

第四步是分配土地，颁发土地证。土地有好坏多少之差，以乡为单位进行调剂，以村为单位进行分配，分配中注意好坏、远近、水旱搭配，适当照顾军烈属和鳏寡孤独。对地主分子亦分一份，以促使其通过劳动改造，由剥削者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房屋的分配，主要是分给没有住处的贫雇农户，挤一挤，齐翻身。家具农具的分配则是自报公议，对新安家缺乏农具的户给予照顾，同时在满足贫雇农要求时，也适当分些给中农，以利于对他们的团结。

四、生死大搏斗

土地改革是贫雇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过程，是一场短兵相接的，面对面的阶级大搏斗。在这场斗争中，地主阶级由于不愿退出历史舞台，更不甘心被消灭，必然要进行疯狂的反抗。因此在土改过程中，烧房子、打黑枪、甚至杀害佃户之事时有发生。贫雇农民要在斗争中

取得彻底胜利，只有不断提高阶级觉悟，才能团结起自己的力量，打垮地主阶级。土改中提高阶级觉悟的办法主要是开诉苦会，通过面对面的诉苦斗争，控诉地主剥削压迫农民的严重罪行。许多农民在诉苦会上的控诉是非常典型具体的，如有的佃户被地主赶出家门，大年三十无家可归而夜宿街头；有的佃户被债主逼得卖儿卖女，家破人亡；有的则因地主加租夺佃，被逼得走投无路，投河上吊。这一笔笔血泪仇，阶级恨，真是触目惊心，会场上往往哭声一片而无法继续进行。通过诉苦会，恶霸地主大多威风扫地，农民群众觉悟很快提高，团结战斗的力量和信心也越来越大。

土改初期，通过诉苦会重点打击的主要是那些血债累累的恶霸地主，这样容易震慑和分化地主阶级。如贾嗣乡和杜市乡一带，一些地主开始不愿低头认罪，说城里廖海涛大爷还在，没来头。当廖海涛被镇压后，这些地主才纷纷交出了财产，以赔偿农民的损失。但是，能低头认罪的地主始终是少数，作为整个地主阶级来说，他们是不甘心被消灭的。在县委召开黑石山会议前，地主的气焰十分嚣张。如大地主田树清曾对雇农说：“分了我的田，拿了我的东西，拿回去容易，明天拿出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公开威胁叫把东西给他送回去。有的地主通过请客送礼收买干部，有的甚至通过嫁女儿等手段，拉拢本地农会负责人。据四十七个乡统计，被收买过的村干部竟达813人次。有了靠山以后，许多反动地主疯狂反攻倒算，公开烧农民的房子，甚至操纵民兵枪枝，在斗争会上枪杀贫农。这些血淋淋的事实告诉我们，工作队早期执行政策过于宽大，放手发动群众还很不够。在黑石山会议上，我们纠正了过去的一些作法，一方面继续放手发动群

众，另一方面对个别反动地主坚决给予镇压，保证了全县土改工作的顺利进行。

随着对“右”的错误的纠正，有些地方却又产生了“左”的倾向。在某些乡村发生的乱打、乱斗现象，也干扰了土改工作的正常开展，对此，县里在发现后也及时进行了纠正。经过这样几个回合，农民在斗争中学会了斗争，政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当时，许多大地主都住在城里，为了达到既消灭地主阶级又保护合法工商的目的，县里在城关区和白沙镇成立了农会城乡联络站，凡农民进城揪斗地主，都须经联络站批准。有关政策规定，对工商业兼地主的按工商业对待；对地主兼工商的，其工商业部份不能动；对民主人士，政治上要求其承认罪行，经济赔偿问题上则量力而行。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做得比较好，对分化敌人，减少阻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起到一定的作用。由于执行政策好，干部力量强，江津县的土地改革工作仅用了六个多月，于1951年年底基本结束。

五、胜利的尾声

土地改革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解放农民的生产力，巩固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根据我县土改工作的实践，这几个目标都达到了。据统计，全县在土改中共没收、征收土地150万石左右，分配给15407户雇农，人平8.14石；62384户贫农，人平6.21石，（同时也适当分了些给部分中农），加上房屋、耕畜、农具、粮食和部分现金（人均40元），农民的生活、生产条件大大改善，为农业生产的大发展做好了物质准备。

经过土改，全县农村彻底废除了封建的保甲制度。农民协会经过整顿发展，会员达到335724人，贫下中农掌握了村政权，工农联盟有了坚实的基础。全县民兵组织也经过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整顿，发展到25834人，贫下中农掌握了枪杆子，人民民主专政从此有了根本的保证。在清理浮财的过程中，全县共缴获长短枪149支，子弹12523发，手榴弹142枚以及部分雷管、炸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地主阶级的武装力量，保卫了土改胜利成果。

为了保证土改工作符合政策，善始善终，县里在全县土改基本结束后，随即组织了复查。全县仍然分为三期，每期二十到三十天，以处理那些煮了“夹生饭”的乡、村土改遗留问题。计三期共处理进行各种破坏活动的地主分子980人次；经济上复查出一些胜利果实；对一些划错了成份的，也认真进行了纠正。有些地方（如龙门等地）在评产时把柑桔产量评高了，引起群众不满，复查时也给予了纠正。这些努力，保证了整个运动的健康发展，据土改四十年来的信息反馈，我县的土改工作是成功的。从此，在江津大地上，农民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实现了历史性的翻天覆地的根本变化。

江津农业主要项目概况

王 勋 钟 顺 宾

江津县1980年底，有14个区，4个区级镇，88个乡，8个乡级镇。幅员面积3,202平方公里，（折合480.3万亩）。现有耕地112.42万亩。其中：田75.37万亩（冬水田51.77万亩）；土37.05万亩。总人口143.97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25.54万人（正、半劳力68.61万人），人均耕地0.9亩。

土壤由9种母岩风化发育而成。分4个土类，8个亚类，25个土属，72个土种，110个变种。水稻土占61.2%，紫色土占34.7%，黄壤土（不包括林地）占3.4%，冲积土占0.7%。

县境内气候温和，年平均气温13.6℃（四面山地区）——18.4℃（几江地区）；年均降雨量1030.7毫米（几江地区）——1550.2毫米（四面山地区）；年均日照1,273.6小时（南部偏少）；无霜期341天。农业生产以粮食为主，大春为主，水稻为主，特产柑桔，是古老的粮食之仓和柑桔之乡。

民国及其以前，封建土地所有制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农业生产发展缓慢。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农业总产值12,229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以下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陆续开展了以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和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1952年初，朱沱区涨谷乡建立起梁金华第一个互助组。1954年春，慈云、高屋、金

龙（今石门）等乡建立起8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大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农户占94.9%，实现了农业合作化。粮食、油料、柑桔、生猪等逐年增长，当年，农业总产值增加到15,740万元。1958年，贯彻总路线，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9月8日，建立起全县第一个人民公社——李市人民公社，9月28日，全县94个乡镇建成71个人民公社，以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取消按劳付酬的评工记分办法和分配制度，推行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和工资制（按月发工资）。这就使得以高产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农业生产逐年下降。1961年，农业总产值降至8,714万元。1962年，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恢复按劳计酬的评工记分和分配制度，农业生产迅速恢复。1966年，农业总产值上升到16,849万元。“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批“资本主义”，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推行“大寨式”评工记分，平均主义思潮泛滥，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致使农业生产徘徊不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落实和完善以“户营为主”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商品经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1990年，农业总产值达53,717万元，比1978年增长1.63倍，比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增长3.39倍。

粮食作物有：水稻、小麦、玉米、红苕、高粱、豆类等，以水稻为主。新石器时期，已有水稻的种植（1980年，梳坪乡王爷庙遗址出土文物——耜，即新石器时期先民耕种水稻的工具）。清康熙年间，邑民从贵州引进玉米。乾隆三十

年（1765年），知县曾受一从广东引进红苕。光绪年间，“每岁输出谷米十余万石，红苕千余万斤，高粱白酒四、五千缸、胡豆五、六千石”。民国初期，白沙已发展成为四川省较大的粮食市场，输出谷米1000—1500万公斤，豆类300—350万公斤，“高粱酒甲于省”。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171.3万亩，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87.6%，总产32,347.5万公斤。其中：水稻85万亩，总产16,340万公斤；小麦19.6万亩，总产1,132万公斤；红苕17.8万亩，总产2,031万公斤；高粱14.7万亩，总产1,293万公斤；玉米6.8万亩，总产447.5万公斤；豆类26.7万亩，总产2,076万公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积极兴修水利，推行麦、稻、双季稻；麦、稻、苕；麦、梁、苕等两熟和三熟的耕作制度，扩大“中农4号”（水稻）、“南大2419”（小麦）、“南瑞苕”（红苕）等良种面积，推广水稻“好种壮秧、少秧密植、合理施肥”等栽培技术，粮食产量逐年上升。1956年，粮食播种面积216.1万亩，总产33,371.5万公斤。其中：水稻107.8万亩，总产21,988万公斤；小麦29万亩，总产2,636万公斤；红苕24.7万亩，总产3,611万公斤。1958年，盲目大放干田，采取高深耕、高密度、“三向”条栽、二次移栽等措施，粮食产量大减。1961年，粮食播种面积减少为172.1万亩，总产量降至13,916万公斤。其中：水稻52.3万亩，总产7,910万公斤；小麦45.4万亩，总产2,081.5万公斤；红苕37.8万亩，总产2,730万公斤；豆类24.5万亩，总产655万公斤；玉米5.4万亩，总产219.5万公斤；高粱5.8万亩，总产320万公斤。1962年，开始纠正瞎指挥生产，调整作物布局，因地制宜贯彻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工、

管)，推广“麦稻稻”、“油稻稻”、“肥稻稻”等一年三熟制和“四一”、“四矮一梗”梗等水稻良种，粮食生产逐年恢复。1966年，粮食播种面积182.77万亩，总产35,253.5公斤。其中：水稻89万亩，总产21,285.5万公斤；小麦29.29万亩，总产3,309.5万公斤；红苕27.44万亩，总产,6,764.5万公斤；玉米4.69万亩，总产729万公斤；高粱11.2万亩，总产1.237万公斤。豆类21.1万亩，总产1,928万公